

目 錄

序	i
---------	---

篇之甲 史有疑

捱打必因落後？	002
質疑「兩炮論」	005
三問「開眼看世界」	008
「被現代化」的邏輯	018
清史與近代史	021
需要重讀近代史	024

篇之乙 往回看

回眸清代「改革」史	028
「改革」溯源	031
重提「奏銷案」	034
「探花不值一文錢」	038
內滿外漢與重文輕武	042
滿漢雙軌制（一）	046
滿漢雙軌制（二）	050
滿清的天人互變	053
從乾隆回看雍正	057
「偽孫嘉淦奏稿案」	062

篇之丙 說維新

毛奇齡死後遭文字獄.....	075
清代的正史、野史與筆記.....	086
清仁宗反腐	092
看嘉慶「維新」.....	096
皇帝的「罪己詔」.....	099
清帝懷柔英使	104
拿破崙批判英國人	108
清仁宗與拿破崙.....	112
滿清的捐班	115
「盛清」捐班的體制化	118
捐班的「花樣」.....	122
捐班的促銷與直銷	126
小說裏的買官賣官	132
清官與捐班	136
包世臣的《說儲》.....	140

篇之丁 鴉片史

鴉片由藥品變成毒品.....	146
再看鴉片戰爭	150
道光帝「可悲」？	152
林則徐與龔自珍.....	155
還要說龔自珍	158
「以毒攻毒」.....	161
鴉片戰爭留下的疑問.....	164

篇之戊 神和聖

清代的「神道設教」.....	168
在清史上的「今聖」.....	172
武聖怎會壓倒文聖？	175
紀昀與「神道設教」.....	179
「神道設教」的雙重效應.....	182
失敗的「天國」.....	186
羅孝全與洪秀全.....	190
重看「天京內訌」.....	194
海內天國史掠影.....	198
曾國藩歎「名教奇變」.....	202
「華拿二聖」.....	205

篇之己 時趨異

晚清的權力分裂現象.....	214
「立儲」問題（上）.....	221
「立儲」問題（下）.....	225
道咸間清帝的「召對」.....	229
咸豐朝那十一年.....	235
一個歷史悖論	238
圓明園之焚	241
再說火燒圓明園.....	246
肅順這個人	250
辛酉政變和肅順.....	254
勝保的沉浮	259
由咸豐朝說到底.....	264

篇之庚 政難改

「師夷」呢，還是「制夷」？	268
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	271
晚清的軍機處	277
滿清的「儒術」.....	281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難產記.....	284
文祥和總理衙門.....	289
王茂蔭與晚清外交觀.....	293
晚清總理衙門的名與實	298
滿清是否「承敝通變」？	303

篇之辛 記慈禧

由咸豐到慈禧	306
慈禧垂簾的合法性	311
勝保與慈禧	316
勝保非死不可	320
慈禧破了滿清慣例	324
女主慈禧.....	328
誰是甲午戰敗的權首？	332
帝國被慈禧終結.....	339

附錄：歷史上的中國與世界（朱維鈺先生的最後一課）.....	354
-------------------------------	-----

史有疑

篇之甲



捱打必因落後？

直到清英鴉片戰爭爆發之前二十年，即清嘉慶帝死而道光帝立的一八二〇年，中國的總產出（GDP）仍佔世界總份額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九，領先西歐核心十二國（英、法、德、意、奧、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麥、芬蘭）的產出總和十二個百分點，更遙遙領先於美國（百分之一點八）、日本（百分之三）。

由設在巴黎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出版的著名經濟史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世界經濟千年史》（伍曉鷹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頁二六一，附表二十），提出的這組數據，常使我們的中國史讀者感到吃驚。

不是嗎？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的各級歷史教科書，總在反覆地告訴讀者，「落後是要捱打的」。所謂捱打，當然是指中國遭受西方列強（其後又加上日本）的武裝侵略，開其端的就是——一八四〇年英國發動的對華戰爭。

關於這場戰爭的起因，中外學者已有眾多而相互矛盾的解說。中世紀中國向來有崇聖拜經的傳統。滿清諸帝都好自命「今聖」。雍正、乾隆尤其警惕人們非議時弊，一概斥作「狂吠」。於是百年社會基本穩定，造就的經濟繁榮，反而成為政治日趨腐敗黑暗的屏風。二者的巨大反差，促使社會兩極分化愈發劇烈。乾隆生前已出現蔓延川楚七省的白蓮教造反，他剛死又因滿洲權貴

內訌而鬧出「和珅案」，正是映照「盛世」實相的兩面。

所以，倘說鴉片戰爭是因為中國「落後」而捱打，不合乎歷史實相。第一，當時中國經濟並不落後，GDP 仍居世界第一，便是證明。第二，當時中國對外並不封閉。正如經濟史家全漢昇等早已指出，中國是貧銀國，但由明英宗正統元年（一四三六）到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中國實行銀主幣制已達五百年，那源源不斷由日本、美洲流入中國的白銀，渠道就在對外貿易。一個反例就是康熙為對付台灣鄭氏政權而實行「禁海」，立即導致全國銀荒，通貨急劇膨脹，而一旦征服台灣，撤消海禁，銀貴銅賤現象迅即消失。第三，且不說漢唐，夾在蒙元、滿清兩大世界性帝國中間的明朝，疆域囿於長城以內，但初期有鄭和七下西洋，晚期又有徐光啟等南國士紳歡迎利瑪竇、艾儒略等入華，彰顯中國有識之士世界意識的覺醒，便反證所謂到鴉片戰爭時期中國才有人「開眼看世界」的說法如何違反歷史。第四，即使單看邏輯，所謂鴉片戰爭是因中國「落後」才捱打的說法也不通。英國不是首先覬覦中國的海盜，在他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都不斷從海上入侵中國，那都是因為中國「一窮二白」嗎？不然，恰好是因為中國比歐洲富。哥倫布相信地圓說，為突破葡萄牙人的限制，以為向西航行便能抵達中國這個「黃金之國」，不想誤打誤撞「發現新大陸」，就是顯例。打個比方，有強盜要劫掠，一家窮得家徒四壁，另一家卻富得流油，他要冒驚濤駭浪越洋搶掠，豈會棄富選窮？

前引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對於清英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經濟數據的統計和分析，未必完善。比如沒有提及英國東印度公司由於無法打開中國市場，決定強迫印度孟加拉農民種植罌粟，

用鴉片走私方式扭轉對華貿易逆差，結果造成中國白銀外流，卻危害了英國乃至西歐的對華商品貿易。這在馬克思的《鴉片貿易史》等文中早有深刻揭露，而麥迪森卻置之度外。

不過，由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整合的數據與分析，昭示了一個基本史實，即中國在清中葉仍屬全球首富，卻在世界競爭格局中，迅速淪為「東亞病夫」，成為歐美乃至後起的日本競相瓜分的魚肉。那歷史原因，不正在經濟繁榮與政治腐敗、社會黑暗的落差愈來愈大的中間嗎？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夜

質疑「兩炮論」

半世紀來，中國的歷史教科書，總是這樣描述「近代」與「現代」兩個歷史開端：

一曰，一八四〇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依仗「船堅炮利」，把封閉的中國打得門戶洞穿，迫使清朝簽訂喪權辱國的江寧和約，從此中國淪為西方列強的半殖民地。

二曰，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中國人醒悟了，決心「走俄國人的路」。

就是說，前一炮將中國由「古代」打入「近代」，被迫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而後一炮卻把中國由「近代」引向「現代」，跟着蘇俄進入列寧、斯大林建構的社會主義的新世界。

關於以腰斬清史界定的中國近代史開端，關於五四運動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的直接影響下發生，而成為中國現代史的起點，都有毛澤東的經典指示為依據。

我對「兩炮論」由篤信而懷疑，過程長達二十年。按照「兩炮論」，沒有英國炮艦打遍中國萬里海疆無對手，滿清道光皇帝豈肯同意「白下之盟」？沒有「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陳獨秀、李大釗等能在蘇俄特使指導下建黨嗎？據此邏輯，中國進入「近代」，當然是被英國大炮「轟入」的，而中國能夠進入「現代」，當然也是遙遠的阿芙羅爾號大炮轟出蘇俄的回應。

但看邏輯，都可通。因而拙著《走出中世紀》，於一九八七年冬問世，已故的陳旭麓教授便對拙著命題進行批判，說是應該正名為「轟出中世紀」。

問題在於邏輯應與歷史相應。中國開始告別中世紀，是自行「走出」，還是被外來侵略者「轟出」？一字之差，卻涉及中華民族的內在精神。一八四〇年的清英鴉片戰爭，滿清的萬里海疆，居然被區區數十艘英國桅帆船，其船也不堅，炮未必利，打得沒有招架之力，難道可證中國沒有能力自行走出中世紀嗎？中外歷史早已表明，那次戰爭中國的失敗，不敗在軍事，不敗在技術，敗在哪裏？敗在滿清專制體制的腐朽，尤其敗在滿清道光帝的「遙制」，於前敵無所知而坐在紫禁城中瞎指揮。以後清法、中日戰爭慘敗，直到扶植義和團而導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罪魁禍首必定要追究到慈禧太后，歷史理由也正在於體制的徹底腐敗。

至於「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是否將中國「轟出」近代，那是別一問題。從歷史來看，由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那三十多年的內外戰爭史，便不可能令人相信「轟出」論。

清末的中國疆域，歷經沙俄、日本的侵奪，已較康熙時代的大一統帝國疆域縮小很多，但仍比斯大林強奪外蒙及唐努烏梁海以後的民國疆域大得多。那以後中華民族，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漢族雖屬人數最多的民族，但如周恩來所謂，非漢族的邊疆民族，分佈區域實佔今日中國面積的百分之六十。而我們的近代史或現代史，常將非漢族置諸度外，這合理嗎？

作為如今全球最大的民族複合體，中華民族早就在走自己的道路。論民族或族群的數量，中國或不及印度或蘇俄，但論整個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為何「近代」中國沒有如印度淪為英國殖民

地？為何「現代」中國沒有如蘇聯那樣膨脹而突然解體？當然是全球史研究的最大懸案。

顯然，質疑「兩炮論」，進而探究近現代中國是否「被現代化」，都應屬歷史研究再出發的起點。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夜

三問「開眼看世界」

誰先注目地球那一面？

當林則徐於一八三九年春抵廣州就任欽差大臣伊始，首先採取的措施，並非搜繳鴉片，而是找人編譯「澳門新聞紙」，以了解「夷情」。

此舉立即引起在粵外國人士驚異，從中看出林則徐與那班有權而無知的清朝官僚不同。但林則徐將搜集的外論編成《澳門月報》，寄呈道光帝，卻未見直接回應。與此同時，林則徐又找人將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介紹一書，譯成《四洲志》，也只是在他被革職流放以後，才被魏源、徐繼畲等相繼取材，各自編書，如《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

直到林則徐去世（一八五〇）以後四十多年，鼓吹變法維新的康有為，重提舊事，說「林文忠始譯洋報，為講求外國情形之始」。這個判斷雖不合歷史實相，但前提限於「始譯洋報」，還不算太離譜。

離譜的是一九五三年新訂的中國近代史一部權威教科書的評價：「林則徐是清朝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猶憶我初讀此論，正上大學二年級，其時恰值提倡「百家爭鳴」，在課堂上聽胡繩武、金沖及先生介紹此論，以為僅屬一家之言。豈知時過四分之一世

紀，此論突然紅得發紫，似乎已成闡釋中國近代史開端的定論，使我在好奇之餘，重尋晚明至清初的中國人的世界認知史。很不幸，發現此論堪稱反歷史。

且不說中國人的世界認知，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古典時代。但看從西漢張騫通西域到明初鄭和下西洋那一千六百年間，中世紀列朝與域外世界的聯繫，從未中斷，難道都是閉眼瞎摸嗎？中國號稱地大物博，唯獨銀礦稀少，然而從明英宗正統元年（一四三六），徵稅開始以白銀計算，很快演化成貨幣以銀為主的複本位制，直到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以紙幣代銀元，那中間白銀的補充儲備，都源於對外貿易吸納的美洲與日本的銀塊銀元，不是早為中外貨幣史家的研究證實了嗎？滿清六世大君道光帝派遣林則徐赴廣東查禁鴉片走私，真實理由在於抑阻「白銀外流」，以及由此引發的帝國軍政危機（即林則徐擁護黃爵滋嚴禁鴉片論所謂，如不禁毒，前景必為「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不也反證皇帝本人早在注意域外世界與帝國安全的相關度嗎？

其實略知由順治到道光的滿清六帝的對外認知史，便不能說在林則徐編譯並上奏《澳門月報》以前，清廷從未「開眼看世界」。否則，順治帝尊德籍耶穌會士為「瑪法」（滿語之「爺爺」），康熙帝曾派法國外方傳教會士白晉返國要求路易十四增派傳教士來華，雍正帝在殘酷打擊宗室基督徒的同時又留下穿戴歐洲貴冑衣裝假髮的「御像」，乾隆帝欽定的《四庫全書總目》對元明清的西洋圖書譯著的提要與批判，嘉慶帝依然任命西洋欽天監正為帝國制定曆法並提供占星預言，乃至道光帝還關注白銀由內流到外流的對外貿易得失，諸如此類，在歷史上就變得難以理解。

我曾相信「落後就會捱打」是歷史真理，也曾相信自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中國淪為半殖民地乃至幾乎亡國，原因在於毛澤東所謂工業或技術不如歐美日本列強。哪知三十三年前被迫為工農兵「批儒揚法」的事業服務，替那些理論家們註釋近代文獻並定期接受「知識私有」的批判，於是將習史重心轉向鴉片戰爭以來的全部所謂近代史。嗣後幸獲平反，重上講台，也就難免將重讀近代史產生的積疑，由口說形諸文字。質疑源於毛澤東的「落後就會捱打」論，捱批是必然的，因為涉及已被教科書視為定論的近代史界定問題。這裏不想辯解，但引十六年前的一段拙論，此論見於〈道光帝和他的首相〉一文，其中指出道光帝在位三十年（一八二一至一八五〇），恰等於中國傳統所謂一世：

這一世，照愛好高論者的說法，國際國內環境都是有利的。不是嗎？滑鐵盧戰役之後的歐洲，並沒有因為神聖同盟充當國際警察而結束多事局面，西方列強爭奪的重點仍在西半球和中近東，即使英國，在亞洲關注的，也首先是印度和阿富汗。由民族主義與重商主義相結合而形成的帝國主義，還沒有把戰略重心移向遠東。國內呢？道光接掌政權，比乃父順利得多，在朝沒有碰到跋扈的權臣，在野也沒有仍在造反的白蓮教，儘管內地還有零星的民眾暴動，邊疆仍有局部的民族動亂，總的看來社會尚處於相對的穩態（引自拙著《音調未定的傳統》，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初版，頁一七四）。

那時我注目的重心，在於探究道光朝在國際國內環境條件都對中國有利的態勢中，滿清帝國何以不能如龔自珍期望的，進行

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我在《維新舊夢錄：戊戌前百年中國的「自改革」運動》一書的導讀中（三聯書店二〇〇〇年初版，頁二一至七二），已論證指望滿清統治者自行進行體制改革是幻夢。但回頭看清英鴉片戰爭前夜的歷史實相，倘將戰爭失敗的原因，歸咎於滿清統治者對域外世界無知，從而斷言自林則徐赴廣東搜集洋人書刊提供的情報，才使中國人「開眼看世界」，那說法竟被中國近代史教科書肯定，不奇怪嗎？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四日夜

難道中國人只會見銀眼開？

有的近代史作品，稱道「清朝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總把林則徐、魏源並提，還有人乾脆說魏源才真正開始「開眼看世界」。

那依據，來自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本人透露的消息。清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五六月間，被皇帝下令發配伊犁充軍的林則徐，赴戍途中在鎮江會晤舊友魏源。據魏源《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詩二首之一自註，說林則徐將在廣東兩年多輯集的《四洲志》資料付給他，「屬撰《海國圖志》」。時過年餘（一八四三年初），魏源的《海國圖志》五十卷本成書，自敘雖也提及「一據」《四洲志》，卻強調全書曾遍徵中外史志及「近日夷國夷語」，乃新「作」，並特別聲明，已作「何以異於昔人海圖之書（當然包括《四洲志》、《澳門月報》等林輯諸書——引者）？曰：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

其時上距道光帝批准喪權辱國的清英江寧條約（一八四二年

八月二十九日簽訂)，僅四個月，滿清朝野上下多半懵於「夷情」，有的大臣甚至不知英吉利為何物。如今突然冒出一部《海國圖志》，作者自稱「以西洋人譚西洋」，而且宣稱握有「籌海三策」，無論針對英吉利的「攻夷」、「款夷」或「制夷」，都應對有方，怎不引人注目？又有幾人去追究其主意與倒霉的林則徐的世界認知的聯繫？

於是，《海國圖志》甫出就行時，「作」者魏源也放手大抄續出譯著，在道光二十四年、二十七年兩出增補本，篇幅增至六十卷到一百卷；他本人也名聲大噪，乃至時過一個半世紀，竟在大陸近代史界躍居「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可謂匪夷所思。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襄助周予同先生編註《中國歷史文選》，選註《海國圖志》「籌海」二篇，已從書中發現魏源明徵暗

引林則徐著譯，遠不止《四洲志》，還有林則徐奏稿及其編譯的《華事夷言》、《澳門月報》全稿。「文革」後我修訂這部教材，對林、魏著述再研究，愈來愈感到魏源不老實。一個疑點，便是林則徐從未提及會見魏源「屬撰《海國圖志》」一事，而且林氏由這年到復出而去世凡十年，在遺存文獻中竟無隻字道及魏源其人其書，怎麼回事？

這使我重新考察《海國圖

志》初刊五十卷本的成書過程，卻吃驚地發現，魏源在「海夷就款江寧之月」，即清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九（一八四二年九月十三日）之前，正忙於編寫頌揚滿清征服全國的《聖武記》。只是在道光帝准行江寧條約賣國各款的上諭傳到南京之後，才將自稱林則徐「屬撰」的《海國圖志》提上日程。他的行文如此神速，邊寫邊刊，僅至同年十二月初三（一八四三年一月三日），五十卷本便在揚州問世，總共三個半月，就是說平均每兩天便寫成刻成一卷。

我曾指出，這以前魏源〈書趙校水經注後〉一文，指斥清四庫館採用的戴震校定的《水經注》，是剽竊趙一清校本，並不顧其友龔自珍的情面，直斥龔氏外祖父段玉裁替乃師辯護為貽誤後學。他找到的旁證，便是趙一清曾修《畿輔水利志》一百六十卷，而戴震應直隸總督方觀承要求，僅用半年便改編成八十卷，「知其必有底稿，非出戴一人之手；戴既據趙為藍本，何以凡例中不一字及於原書，深沒其文，若同創造？」刪簡並非剽襲，因此魏源據此控告戴震不德，難以服人。可是他沒有想到，這一控告恰好可用於自身。他既自認《海國圖志》是林則徐「屬撰」，因緣時會而暴得大名，卻又竭力撇清其書其策與林則徐的關係。而他在鴉片戰爭期間的經歷證明，他其實對於鴉片貿易史和清英衝突史均無所知，更從未系統研究過世界史地。在江寧條約簽訂不過四個月之後，突然現身為「洋務」歷史與現狀的專家，不是很奇怪嗎？聯繫到他曾自陳得到林則徐在廣東輯譯的全部材料，那麼他的《海國圖志》初刊本，成書如此神速，其書只可說是「述」，而「述」又埋沒主名，要是指其剽竊，豈非屬實？

經過多年的猶豫，我將積疑寫成〈魏源：塵夢醒否？〉一文。我不想爭辯「清朝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究竟是林則徐呢，還是



《海國圖志》書影。該書在這一部分採用了林則徐主持編譯的《澳門月報》資料。

魏源？因為那原是偽命題，稍知中外文化交往歷史的學者，無不嗤之以鼻。我感到奇怪的，是這個偽命題，居然在近代史學界得到鄭重討論，而主流的號稱權威或核心的歷史刊物，居然對此謬說表示沉默乃至附和。

十八年前的那篇拙作（載拙著《音調未定的傳統》，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初版，頁一九二～二一〇），曾惹怒某位魏源研究專家，撰文對拙說痛加撻伐。但我還是以為，重讀近代史，這是不得不重予考察的歷史課題。恩格斯說「義憤不能代替科學」。我至今仍盼得到來自「嚴肅的歷史學」的駁斥。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六日夜

豈可說先人閉目塞聽？

俗話說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其實「和尚」這個職稱也是由古印度引進的。兩漢以來，有班西域和尚跑到中原教人念佛經，初用梵語，沒人聽懂，於是出現譯經，當然要借用漢字翻譯佛經的專門術語。久而久之，那些術語融入古漢語，以致人們忘記它們原是外國來的。相反呢？有的外來語詞，古已有之，講漢語的無不習用，卻被愈無知愈無畏之徒當作「近代」才出現的。新例之一，即題中的「世界」。

「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這是唐代詩人岑參在安祿山造反前爬上長安慈恩寺塔而留下的名句。不消說，此前「世界」一詞必已見於漢譯佛典。如今各類辭典都說它原出《楞嚴經》。撇開佛學史家對《楞嚴經》譯者為誰的爭論，有一點可以相信，譯經

的和尚生活在八世紀初唐中宗復辟前後，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年，可謂古矣。

前篇稱引林則徐是「清朝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出處，是范文瀾先生的《中國近代史》上編。人稱范老的范先生，是我生平尊重的前輩史家。他另一部未完成的《中國通史簡編》，同樣是我讀大學時的權威教科書。其中說到隋唐佛學，痛斥那時代由古印度經西域東漸的外來和尚，最會吹牛撒謊，曾誘發我一窺中世紀中西宗教文化交往的歷史過程的好奇心，從而通讀已被「打成右派」的向達先生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並且邊讀邊對照張星烺、馮承鈞等先生輯譯的相關史料。由此略知中古列朝與域外世界交往的歷史常識。魯迅常說，「師如荒謬，不妨叛之，但師若非罪遭冤，卻不可乘機下石」，在我看來堪充座右銘。座師周予同先生，論中國經學史的取向，與范老異趣，卻一直將范老早期著作《群經概論》、《正史考略》，列為學生的必讀書。在一九五八年范老發表〈反對放空炮〉，鼓吹「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而遭陳伯達之流暗彈明譏，那以後周予同先生在課堂上愈發稱道范老關於「山窮水盡的經學」的說法乃卓識，更使我體會前輩學者互為諍友的風範。

三十年前，我被迫轉向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史的原典註釋，後來又以此為業，開始重讀近代史的生涯。面對范著《中國近代史》上編表彰林則徐是「清朝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歷史判斷，以及繼其說者力讚魏源比林則徐更屬中國「開眼看世界」先驅之類說法，未免生疑，以為有悖於古近中國的世界認知史的傳統實相。曾聞范老於一九六九年七十六歲去世以前，拒絕江青傳達的聖意，不願按照「為革命研究歷史」的極「左」要求，改寫續寫

他的通史名著，由此對范老的風骨倍生敬意。

我卻不能不正視他自任延安馬列研究首席史家之後，便陷入「以論帶史」的誤區。在延安整風年間，毛澤東便不倦地宣傳「兩炮論」，首先強調清英鴉片戰爭那一炮，將中國由長期停滯的封建社會，打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只因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驚醒了他，於是中國才「東方紅，太陽升」。那時候范文瀾和他率領的史家群體，極力證成毛說，固然背後有康生嚴密監視意識形態的魔影作祟，卻也不能不令人惋惜他已背離自己曾經篤信的乾嘉漢學「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傳統。

自從我誤入「近代史」廟堂，碰撞主流史學，便時時感到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的影響無處不在。比較起來，我寧願向學生推薦胡繩的早期著作《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以為它和胡繩批判馮友蘭「貞元六書」的舊著，在學術史上均可列入「立言」的不朽作品。

似乎又離題了，趕緊回到本文主題，即通觀中國史，誰先「開眼看世界」？這是個偽命題。假如承認歷史上的中國人與外國人一樣，並非見錢眼開，而是通過旅行、戰爭或貿易，不斷認知域外世界，那就連《山海經》描述的海外東西南北四經，也不能說是先民的幻想。司馬遷說張騫「鑿空」，開拓的認知空間，固然沒有超出中亞和南亞，但同時代的羅馬帝國，凱撒也炫耀的絲綢服裝，是否激發東西方互相認知的渴望乃至通使呢？至少由公元一世紀的漢使甘英跑到地中海東岸的史跡可證。

那以後，中國經歷王朝更迭，不斷出現南北分裂，但無論中原一統，或是列朝並立，通過陸上或海路的中外物質與精神的互動從未中絕，不是早為中外交通史反覆證實麼？

因而，我不敢苟同范著《中國近代史》上編的說法，即滿清一統中國的過程已歷二百年，對全球的歷史，幾無所知。直到林則徐跑到廣東搜集澳門出版物並找人翻譯，表徵中國人從此「開眼看世界」。

范文瀾魂歸道山快四十年了，按照他在大躍進時代的「反潮流」言論，按照他在「文革」中間還給江青碰軟釘子的操守，他是否在重新討論中國近代史的時候，再會宣稱誰是「清朝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按照邏輯，應該不會。但邏輯終究不能代替歷史，我們只好對他的失誤表示惋惜。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五日夜